

## 北門禁軍與武德九年玄武門政變之 關係考辨——以常何為中心的考察

李 軍\*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實施了旨在奪取最高權力的玄武門政變。世民之所以能在太極宮內設伏，以及建成在接到宮內示警的情況下仍堅持入宮，恐均與此際在北門禁軍任職的常何無關。雖然世民在政變前曾通過常何收買禁軍中的豪傑之士，但我們並未發現常何及北門禁軍曾參與政變籌畫過程的直接證據。從玄武門政變的具體實施步驟看，北門禁軍也只是參與了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並非決定事變走向的關鍵力量。如果將記載常何生平事蹟的碑文與高宗朝製作的玄武門政變功臣的石刻文獻進行對比，也可證明常何或與玄武門之變並沒有太大的關聯。

關鍵詞：玄武門之變 常何 北門禁軍 石刻書寫

---

\*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一、前 言

二、陳寅恪「北門之說」獻疑

三、北門禁軍與玄武門政變籌畫及實施之關聯性

四、從石刻書寫看常何與玄武門之變的關係

五、結 論

## 一、前 言

以武德九年（627）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為發端，唐前期宮廷變亂迭起，極大地影響了唐代的歷史進程。上述政變多與作為宮城北門的玄武門存在關聯，故陳寅恪明確指出唐代「守衛宮城北門之禁軍，以其駐屯地關係之故，在政變之際，其向背最為重輕，此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所以往往繫於玄武門衛軍之手者也」。<sup>1</sup>由於史書記載多有所隱晦，陳寅恪在論述北門禁軍與武德九年玄武門政變之關係時，主要以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李義府撰 P. 2640〈大唐故使持節都督黔思費等十六州諸軍事黔州刺史贈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武水縣開國伯常府君（何）之碑〉（以下簡稱〈常何墓碑〉）為據，<sup>2</sup>認為常何是政變中的關鍵人物。<sup>3</sup>雖

---

1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重慶：商務印書館，1940年；此據北京：三聯書店，2001），2〈禮儀附都城建築〉，頁70。

2 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7冊，頁53-56。

3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2〈禮儀附都城建築〉，頁71；《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頁41；〈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嶺南學報》，12：1（廣州，1952）；此據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25-226。

然此後黃惠賢、黃永年兩位曾撰文質疑常何在玄武門之變中的作用，<sup>4</sup>但陳寅恪的觀點顯然得到了學術界更為廣泛的承認。<sup>5</sup>本文希望在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澄清常何及北門禁軍與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的關係，或有助於對唐初政治史的理解。

## 二、陳寅恪「北門之說」獻疑

常何，兩《唐書》無傳，其事蹟只是散見於《舊唐書·太宗紀下》、《新唐書·李密傳》，以及兩《唐書》的〈馬周傳〉、〈東夷傳·高麗傳〉等。P. 2640〈常何墓碑〉對常何的生平敘述甚詳，其中頗有與隋末唐初之政治史相關者。<sup>6</sup>其中，對於常何與建成（589-626）、世民（598-649, 626-649 在位）雙方及玄武門事變的關係，〈常何墓碑〉載：

太宗文皇帝出討東都，以公為左右驍騎……從隱太子討平

---

4 黃惠賢指出玄武門政變後，常何不僅沒有被納入武德九年十月的食實封功臣行列，在職任上也只是以折衝都尉長上。所以，其認為：「常何雖是北門長上，地位實不重要，實際不過順從太宗而已，其初非秦府死黨，此時亦非奪門元勳，恐陳先生推闡過深。」參〈〈常何墓碑〉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武漢，1980），頁16-17。另參黃永年，〈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廷政變中的玄武門〉，《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頁132-153。

5 採用陳寅恪觀點的論文，主要有鄭必俊，〈敦煌寫本常何墓碑校釋〉，收入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210-231；劉進寶，〈常何與隋末唐初政治〉，《中國史研究》，1998：4（北京），頁86-95；曹印雙，〈「玄武門之變」史事新解〉，《歷史教學》，2005：6（天津），頁66-69。

6 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冊，頁53-56。

河北……(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賜金刀子一枚,黃金卅挺,令於北門領健兒長上,仍以數十金刀子錫驍勇之夫,趨奉藩朝,參聞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繞帳之深誠。九年六月四日,令摠北門之寄。<sup>7</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附錄〈都城建築〉在論述北門禁軍與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關聯性時,最早將常何與玄武門之變聯繫起來。<sup>8</sup>其後,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中,對常何與玄武門之變的關係進行了進一步論述。<sup>9</sup>1952年,陳寅恪又撰成〈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一文,詳細分析了常何在玄武門所起的作用,認為其是政變中的關鍵人物: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事變為太宗一生中最艱苦之奮鬥,其對方之建成、元吉亦是智勇俱備之人,謀士門將皆不減於秦府左右,其結果則是太宗勝而建成、元吉敗者,其關鍵實在太宗能利用守衛宮城要隘玄武門之山東豪傑,如常何輩……觀太宗既賜何以金挺,復以數十金刀子委何以錫守衛玄武門驍勇之夫,則是用金寶買通玄武門守衛將士,此與建成、元吉以金銀器物贈與尉遲敬德者,抑何以異?此蓋當時兩方習用之策略也。職是之故,太宗能於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預伏其徒黨於玄武門,而守衛將士亦竟不之發覺,建成、元吉雖先有警告,而不以為意者,殆

7 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冊,頁54。

8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2〈禮儀附都城建築〉,頁71。

9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頁41。

必以常何輩守衛玄武門之將士至少非太宗之黨徒也。碑文所謂「九年六月四日令搃北門之寄。」則此事變中何地位之重要及其功績之偉大，據是可推知矣。<sup>10</sup>

根據〈常何墓碑〉所載，李世民確曾以金寶賜予常何，並利用其收買玄武門的守衛將士，但時間卻早在武德七年（625）常何被徵召回長安之初。武德七年之際，雖然因為嫡位之爭，世民與建成之間已經產生罅隙，但世民應還沒有形成以武力發動政變的想法。從事後的歷史進程看，直至武德九年六月一日，李世民才決意以秦府將士為核心的武力集團解決雙方的爭鬥。所以，世民收買常何及玄武門驍勇之夫應只是積蓄力量的常規舉措。如果說世民收買常何等人就是為了此後的玄武門之變做準備，則未免對其運籌帷幄的能力太過高估。

對於陳寅恪所言建成、元吉以金銀器物贈與尉遲敬德（585-658）之事，《舊唐書·尉遲敬德傳》載：「隱太子、巢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sup>11</sup>除敬德外，建成和元吉（604-626）還曾競相以金帛招誘世民麾下的段志玄。<sup>12</sup>此外，此前出任秦王府右二護軍的薛萬徹，則被建成招引至左右，並在玄武門之變發生後，率領宮府兵攻擊北門。<sup>13</sup>雖史無明言，但世民亦同樣有收買建成、元吉屬下的行徑。因免官而改事秦王府的前齊王府典籤裴宣儼，以及在玄武門政變

10 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頁 225-226。

11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68，〈尉遲敬德傳〉，頁 2497。

12 《舊唐書》，卷 68，〈段志玄傳〉，頁 2505。

13 《舊唐書》，卷 69，〈薛萬徹傳〉，頁 2517。

前夕將建成、元吉圖謀密告世民的太子率更丞王晔，應均屬此類。<sup>14</sup>而李建成在成功渡過武德七年（624）楊文幹之亂所帶來的政治危機後，直至玄武門之變爆發，太子之位始終比較穩固。在得到高祖充分信任的前提下，其沒有必要花太大的精力去拉攏禁軍將領。所以，在進一步加強東宮軍事力量的同時，李建成主要是希望通過各種手段以削弱世民的力量。

陳寅恪之所以認為常何及北門禁軍在玄武門政變中作用巨大，主要是從世民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預伏其徒黨於玄武門，以及建成、元吉雖先有警告而不以為意等兩個方面加以論述。現結合學者已有研究及相關史料，針對上述兩點略作討論。

對於世民之所以能在六月四日帶領尉遲敬德等人於玄武門內設伏，黃永年根據《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中「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的記載，指出李世民等人攜帶武器入宮乃禁軍所習見之事，故六月四日與長孫無忌等人攜帶弓刀等進入玄武門也未遭到阻攔，而非事先收買北門禁軍的結果。<sup>15</sup>劉嘯則認為高祖允許世民等人攜帶武器入宮，乃是建成與世民交惡前的狀況。所以，其認為李世民能在宮中設伏，還是因為常何等玄武門守將被世民所收買的緣故。<sup>16</sup>但根據《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所載，在世民率眾追擊

---

14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191，〈唐紀·唐高祖〉，「武德七年六月壬戌」下注《通鑑考異》引《高祖實錄》，頁5985；《舊唐書》，卷64，〈巢王元吉傳〉，頁2422。

15 黃永年，〈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廷政變中的玄武門〉，頁145。

16 劉嘯，〈玄武門事變新考——以「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0：2（上海），頁161-177。

建成、元吉之際，元吉曾「馬上張弓，再三不彀」。<sup>17</sup>由此可證，在政變發生之際，世民和建成雙方都曾攜帶武器入宮。此外，《舊唐書·忠義傳上·馮立傳》中有「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之語。<sup>18</sup>在馮立等人攻擊玄武門之初，尚不知宮內政變的結果。直至尉遲敬德以建成、元吉之首出示，建成及元吉的部眾才確知兩人已被殺。所以，在馮立等人攻擊玄武門之前逃散的「左右」，不應指東宮的官屬，而是伴隨建成入宮的屬下。建成和元吉在宮內遭伏的消息，應該正是通過逃散的隨從傳遞回東宮的。既然在政變發生之際，建成和世民雙方均有屬下跟從入宮，且均隨身攜帶武器，可見雖建成和世民兩方已經勢同水火，但在高祖（566-635，618-626 在位）未明令禁止的情況下，北門禁軍仍然沿用了此前允許太子和二王「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入宮的慣例。由此可證，李世民之所以能在六月四日於玄武門內設伏，或與常何及北門禁軍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此外，建成之所以在事先得到警告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入宮，也與常何駐守玄武門無關。《資治通鑑》卷 191「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條載：

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

---

17 《舊唐書》，卷 64，〈隱太子建成傳〉，頁 2418。

18 《舊唐書》，卷 187 上，〈忠義傳上·馮立傳〉，頁 4872。

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sup>19</sup>

按照《資治通鑒》的記載，似乎暗示張婕妤已經猜測出李世民要發動政變的意圖，恐未確。《新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則載張婕妤告知建成的乃世民奏建成欲殺世民為王世充、竇建德復仇等語，<sup>20</sup>相較於《資治通鑒》更為可信。李建成之所以在得到張婕妤事先示警的情況下，仍然於六月四日入宮，除了世民所言難以取信於高祖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所謂的「兵備已嚴」。從政變發生後建成部屬與禁軍及秦府兵作戰的態勢看，可知建成所言非虛。

《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記載建成在武德七年即「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蓄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sup>21</sup>此外，根據《高祖實錄》的記載，元吉也曾「募壯士，多匿罪人，賞賜之，圖行不軌」。<sup>22</sup>東宮所募宮甲分屯左、右長林門，應是仿效了北門禁軍左右屯營的建制，所以建成招募長林兵應該是得到了高祖的認可。太極宮和東宮之北為禁苑，且有禁軍駐守，常人無法出入。根據考古實測，太極宮、東

19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 191，〈唐紀·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庚申」，頁 6010。

20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79，〈隱太子建成傳〉，頁 3544。

21 《舊唐書》，卷 64，〈隱太子建成傳〉，頁 2416。《資治通鑒》在建成招募長林兵事後，又載其「密使右虞侯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嵩州。」司馬光，《資治通鑒》，卷 191，〈唐紀·唐高祖〉，「武德七年六月壬戌」，頁 5985-5986。根據上述記載，可知高祖只是對建成從李藝處徵發幽州突騎不認可，其所招募的長林兵並沒有受到影響。

22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 191，〈唐紀·唐高祖〉，「武德七年六月壬戌」下注《通鑒考異》引《高祖實錄》，頁 5985。

宮、掖庭宮三部分東西總的寬度為 2820.3 米，<sup>23</sup>雖然玄武門位於宮城北牆中部略偏西的位置，但由東宮的北門重德門至玄武門也只有區區千餘米的距離。即使建成和元吉在路途中遇到特殊情況，既可迅速返回東宮，宮府兵也可在須臾之間前往護衛。當世民在宮內截擊建成、元吉的消息傳回東宮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隨即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內殿」。<sup>24</sup>《舊唐書·薛萬徹傳》亦載：「建成被誅，萬徹率宮兵戰於玄武門，鼓噪欲入秦府，將士大懼。」<sup>25</sup>《舊唐書·忠義傳上·馮立傳》則載翊衛車騎將軍馮立，在得到建成遭伏的消息後，「率兵犯玄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sup>26</sup>同卷〈謝叔方傳〉載：「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呂世衡。太宗兵不振。」<sup>27</sup>從東宮兵和齊府兵在短時間內即可合力攻擊玄武門及戰鬥的激烈程度看，可知建成一方確實做了充分的準備。只是建成沒有預料到世民將埋伏地點選擇在宮內，倉促之間不得出宮回府，才致落敗。由此看來，建成堅持入宮之事很難與常何建立起必然的聯繫。

---

2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11（北京），頁 595-611。

24 《舊唐書》，卷 64，〈隱太子建成傳〉，頁 2419。

25 《舊唐書》，卷 69，〈薛萬徹傳〉，頁 2517。

26 《舊唐書》，卷 187 上，〈忠義傳上·馮立傳〉，頁 4872。

27 《舊唐書》，卷 187 上，〈忠義傳上·謝叔方傳〉，頁 4873。

### 三、北門禁軍與玄武門政變籌畫及實施之關聯性

武德七年之後，建成和世民之間的嫌隙日增。在沒有得到高祖支援的情況下，身為陝東道大行臺最高長官的李世民，開始利用職務之便，將洛陽作為重點經營的基地。對此，《舊唐書·張亮傳》載：

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sup>28</sup>

《舊唐書·溫大雅傳》亦載：

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刺王之故，命大雅鎮洛州以俟變。大雅數陳祕策，甚蒙嘉賞。<sup>29</sup>

雖然世民有刻意經營的舉動，但在洛州安插張亮、溫大雅等親信，畢竟還屬於未雨綢繆之舉。最終促使世民決意通過武力手段解決爭鬥的，應該為建成和元吉借突厥郁射設入圍烏城之機，通過高祖全面剝奪世民的權力。對此，《舊唐書·巢王元吉傳》載：

會突厥郁射設屯兵河南，入圍烏城。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

---

28 《舊唐書》，卷 69，〈張亮傳〉，頁 2515。

29 《舊唐書》，卷 61，〈溫大雅傳〉，頁 2359-2360。

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兵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遂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眾，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諒無不信……。」<sup>30</sup> 率更丞王晁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sup>30</sup>

對於高祖決意以元吉取代世民的時間，《冊府元龜·外臣部·備禦第三》明確載為：「（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突厥數萬騎圍烏城，遣齊王元吉、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率兵援之」。<sup>31</sup>雖然建成和元吉密謀於昆明池誅殺世民的記載之真實性無法得到驗證，但高祖在建成的建議下，棄世民而用元吉督軍北征，此外還將房玄齡、杜如晦驅逐出秦府，證明世民已經失去高祖的信任。元吉利用此次北征的機會，將秦王府驍將及精銳抽調一空，則世民必然束手就擒。在這種背景下，世民決定放手一搏。在政變前夕李世民猶豫未決之際，敬德曾說世民曰：「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sup>32</sup>正是因為司馬溫公看到了高祖以元吉北征與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的直接關聯，所以將尉遲敬德及侯君集遊說世民之事直接繫於建成推薦元吉領兵北伐事後。由此看來，高祖在六月一日命元吉代世民北征，正是促使世民徵召八

30 《舊唐書》，卷 64，〈巢王元吉傳〉，頁 2421-2422。

31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990，〈外臣部·備禦第三〉，頁 11635。

32 《舊唐書》，卷 68，〈尉遲敬德傳〉，頁 2498。

百勇士入宮，繼而發動玄武門政變的直接原因。

對於秦府八百勇士所入之宮，鄭必俊認為乃指太極宮。與此同時，其還認為在世民、建成雙方鬥爭的決戰時刻，世民之所以能把親兵八百人控弦披甲地遣入宮中，並在政變當天親率長孫無忌等人在玄武門設伏，應與常何六月四日領北門宿衛有關。但正如黃永年先生所論，這麼多的武裝部隊難以在大內歷時多日而不被發覺，故「今悉入宮」應指八百勇士進入秦王府而言。<sup>33</sup>而《舊唐書·尉遲敬德傳》在記載尉遲敬德前往控制高祖之際，「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sup>34</sup>《資治通鑑》亦載：「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sup>35</sup>既然東宮和齊王府可以並稱為「二宮」，那麼秦府勇士被召集到秦王府在上述史料中被記作「今悉入宮」，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再者，如果真有所謂的八百秦府勇士潛伏在太極宮，世民在六月四日當天完全可以通過這些屬下解決建成、元吉，而不必冒著生命危險親自上陣。最後，根據下文所述，「太宗左右數百騎」是在張公謹閉合宮門的情況下，

---

33 黃永年，〈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廷政變中的玄武門〉，頁 152，注 26。另，劉蓬春有兩文涉及玄武門之變，其中〈「玄武門之變」伏兵計考析〉一文認為秦府八百勇士所入之宮為大安宮。參〈「玄武門之變」伏兵計考析〉，《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8：10 增刊（成都），頁 1-6、20。在〈「玄武門之變」伏兵考辨〉一文，劉氏又認為玄武門政變時，李世民曾伏兵於太極宮多達數百人，極可能就是所謂的「八百勇士」。見〈「玄武門之變」伏兵考辨〉，《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8：4（成都），頁 114-121。大安宮位於長安城之西，本名弘義宮，為高祖於武德五年（622）為李世民所建之宮殿。貞觀三年（629）四月，在李淵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該宮後，其名始改稱大安。玄武門政變時尚未有大安宮的建制，劉蓬春所謂之大安宮或指弘義宮。如此，則劉氏一人而言，對於八百勇士所入之宮即有太極宮和弘義宮兩說。

34 《舊唐書》，卷 68，〈尉遲敬德傳〉，頁 2499。

3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1，〈唐紀·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頁 6011。

加入到玄武門外抵禦宮府兵的戰鬥，故其只能來自宮外。這支數百人的有生力量，應就是尉遲敬德口中所說的秦府在外八百勇士。

就在高祖借突厥入侵之機，全面剝奪世民權力的同時，出現了所謂「太白經天」的天文異象。<sup>36</sup>《新唐書·天文志三》載：「（武德）九年五月，太白晝見；六月丁巳，經天；己未，又經天。在秦分。」<sup>37</sup>對此，《資治通鑑》卷 191「武德九年六月」條載：

丁巳（初一），太白經天。……己未（初三），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

庚申（初四），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sup>38</sup>

對於傅奕所密奏之事，《舊唐書·天文志下》載：

傅奕奏：「太白晝見於秦，秦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即位，召奕謂曰：「汝前奏事幾累我，然而今

---

36 胡戟、胡樂首先探討了太白見秦分的天象與玄武門之變的關係。參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收入中國唐史學會編，《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97-125；後改題〈唐高祖與玄武門之變〉，收入胡戟，《胡戟文存·隋唐歷史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 198-223。

37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33，〈天文志三〉，頁 852。

38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1，〈唐紀·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頁 6003-6010。

後但須悉心盡言，無以前事為慮。」<sup>39</sup>

從事後世民對傅奕所言的「汝前奏事幾累我」，一可證明傅奕所奏確有其事，二可證傅奕所奏顯然對世民不利。雖然在《石氏星經》、《荊州占》、《甘氏星經》、《續漢書·天文志》等著作中，「太白經天」皆為凶兆，但尚存在多種解釋。如針對隋文帝開皇元年（581）三月甲申出現的太白經天，最終占卜的結果即為「為臣強，為革政」。<sup>40</sup>李淳風《乙巳占·太白占第三十四》則認為「太白經天晝見」為「國易政，四夷內侵，中國亂，失道者亂亡」的預兆。<sup>41</sup>六月一日的「太白經天」，通過對應突厥郁射設入圍烏城，尚可以指向「四夷內侵」。但傅奕在六月三日密奏時，採用石申《石氏星經》所言的「太白經天，見午上，秦國王，天下大亂」，<sup>42</sup>正可與所謂的「國易政」相對應，目標直指世民。從具體的指向來看，傅奕的密奏應屬於建成、元吉打擊世民的又一重要手段。雖然高祖此時並無殺世民之心，但其以傅奕密奏出示世民，警告的意味非常明顯。為了應對高祖的責難，李世民一方面指責建成、元吉害己，另一方面誣陷二人淫亂後宮。對於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為世充等報仇之語，高祖斷難採信，但因為事涉後宮及儲位，使得高祖不得不召見諸人對質。由此，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眾在太極宮內的臨湖殿附近設伏。

39 《舊唐書》，卷 36，〈天文志下〉，頁 1321。但《舊唐書·天文志》及《舊唐書·傅奕傳》均將傅奕密奏的時間繫於武德九年五月，或誤。

40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21，〈天文志下〉，頁 612。

41 李淳風，《乙巳占》，卷 6，〈太白占第三十四〉，收於《叢書集成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第 712 冊，頁 102。

42 瞿曇悉達撰，常秉義點校，《開元占經》（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卷四十六，〈太白占二〉，「太白經天晝見三」條引，頁 341。

要而言之，六月一日建成通過高祖全面剝奪世民的權力，最終促使世民決意發動武裝政變。而其之所以將政變時間選擇在六月四日，則是緣於六月三日傅奕對於「太白經天」的密奏。由此可見，世民決定發動政變及何時發動政變均與常何及北門禁軍無關。

陳寅恪認為玄武門為事變之關鍵，世民一方之所以得勝，主要是因為其得以兵據玄武門；建成、元吉之所以致敗，則是因為其不得以兵入玄武門。<sup>43</sup>玄武門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但如果詳細考察六月四日當天的政變過程，可知北門禁軍與秦府兵在玄武門合力抵禦宮府兵，只是保證政變成功的諸因素之一。通過考察玄武門政變的過程，可知北門禁軍對政變的參與程度非常有限。

綜合史書所載，可知李世民在六月四日發動的玄武門政變有幾個重要的步驟：

其一，世民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九人於玄武門內設伏，並在臨湖殿附近射殺建成、元吉。這一步驟的實施與北門禁軍的關係，上文已經在黃永年論文的基礎上進行了討論，茲不贅述。

其二，在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人得知宮內變亂的消息，率宮府兵攻擊玄武門之際，玄武門守門兵仗、以敬君弘為首的北門禁軍與秦府勢力合力抵禦。

《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載：

---

43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頁41。

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內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sup>44</sup>

《舊唐書·張公謹傳》則載：「及斬建成、元吉，其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關以拒之。」<sup>45</sup>由此可知，在宮府兵攻擊玄武門之初，雖然起到了張公謹閉合宮門的作用，但尚未有秦府兵參與抵禦，真正起到遏制作用的乃「守門兵仗」，也即左右監門衛的屬下，而並非北門禁軍。在宮府兵發動對玄武門攻擊後，北門禁軍才加入到抵禦性戰鬥之中。對此，《舊唐書·忠義傳上·敬君弘傳》載：

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sup>46</sup>

負責守衛太極宮的北門禁軍在宮府兵攻擊玄武門之際，卻處於未「兵集」及「成列」的狀態，可見禁軍不僅對政變的內情並不知曉，甚至連政變的發展態勢也不掌握。其後，又有所謂的「太宗左右數百騎」加入抵禦宮府兵的戰鬥。《舊唐書·薛萬徹傳》所載在聽聞宮府兵「鼓譟欲入秦府」而大懼的將士，應就是指在玄武門外與北門禁軍合力抵禦宮府兵的秦府私甲。此外，《舊唐書·

44 《舊唐書》，卷 64，〈隱太子建成傳〉，頁 2416-2419。

45 《舊唐書》，卷 68，〈張公謹傳〉，頁 2506。

46 《舊唐書》，卷 187 上，〈忠義傳上·敬君弘傳〉，頁 4872。

忠義傳上·馮立傳》載：

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sup>47</sup>

雖然馮立將殺敬君弘作為報答建成知遇之恩的表現，但在混戰之際，馮立顯然無法明確區分玄武門外多重防禦力量的政治歸屬，故只能籠統將其視為太宗一黨。而這個推測也可印證陳寅恪、黃永年兩位先生所指出的據傳世史料不足以證明敬君弘等禁軍將領為太宗黨羽的論斷。<sup>48</sup>

其三，敬德梟建成、元吉二人首以出示，導致宮府兵潰散。

雖然《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將宮府兵潰敗歸功於「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但據《舊唐書》所載政變參與者的本傳，可知事實並非如此。其中，《舊唐書·尉遲敬德傳》載：

宮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玄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宮府兵遂散。<sup>49</sup>

《舊唐書·謝叔方傳》亦載：

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呂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護

47 《舊唐書》，卷 187 上，〈忠義傳上·馮立傳〉，頁 4872。

48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頁 41；黃永年，〈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廷政變中的玄武門〉，頁 145-146。

49 《舊唐書》，卷 68，〈尉遲敬德傳〉，頁 2499。

軍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sup>50</sup>

《舊唐書·薛萬徹傳》則載：「及梟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sup>51</sup>根據上述記載，可知宮府兵之所以潰敗，乃是敬德出示建成及元吉首級，導致其部眾群龍無首的緣故。

其四，尉遲敬德至高祖泛舟之所，迫使高祖接受世民誅殺建成及元吉的事實。針對「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的情況，高祖應敬德之請，「降手敕，令諸軍兵並受秦王處分」，<sup>52</sup>並派遣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宣敕。《舊唐書·裴矩傳》則載，「及太子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宮城，欲與秦王決戰。王遣矩曉諭之，宮兵乃散」。<sup>53</sup>

從玄武門政變當天的具體過程看，李世民在宮內成功襲殺建成、元吉；玄武門守門兵仗、北門禁軍和秦府兵合力抵禦宮府兵；敬德以建成、元吉之首驅散宮府兵；成功迫使高祖接受既成事實，以上四者均為關鍵環節，而非僅僅關涉玄武門和北門禁軍。在以上四個關鍵環節中，北門禁軍只是部分參與了第二個環節。而且這一環節只是為了維持第一階段勝利的結果，已經不能改變建成、元吉一方落敗的事實。所以，對於北門禁軍與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的關係不宜做過高的評價，更何況只是在禁軍中出任中級將領的常何。

---

50 《舊唐書》，卷 187 上，〈忠義傳上·謝叔方傳〉，頁 4873。

51 《舊唐書》，卷 69，〈薛萬徹傳〉，頁 2517。

52 《舊唐書》，卷 68，〈尉遲敬德傳〉，頁 2499。

53 《舊唐書》，卷 63，〈裴矩傳〉，頁 2408。

## 四、從石刻書寫看常何與玄武門之變的關係

據〈常何墓碑〉的記載，在武德九年六月之前，常何以車騎將軍於「北門領健兒長上」，其官階最高不過從五品。雖然〈常何墓碑〉其後有「六月四日，令摠北門之寄」之說，但根據史書的記載，在政變發生之際，北門禁軍的最高將領並非常何，而應是以從三品的身份「掌屯兵於玄武門」的雲麾將軍敬君弘。<sup>54</sup>所以，〈常何墓碑〉中常何所謂的「六月四日，令摠北門之寄」，只能是在事變結束之後。

學者或認為常何「六月四日，令摠北門之寄」乃太宗的賞功之任，<sup>55</sup>並以此證明常何曾在事變中起到過重要作用。按照慣例，如果常何執掌玄武門確屬賞功之任，其品階當有提升，但事實並非如此。玄武門之變成功後，常何並沒有得到任何升賞，到是年八月才因參與抵禦突厥之功，出任正四品下階「真化府折衝都尉」，從而與玄武門事變中被殺的呂世衡之品階相當。常何卸任北門宿衛後，到了貞觀三年還只是擔任了區區的中郎將，<sup>56</sup>證明太宗對其極其冷落。

雖然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得以成功上位，但「殺兄弟於前殿，囚慈父於後宮」的行徑畢竟為世人所詬病。<sup>57</sup>為了盡可能給

---

54 參黃永年，〈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廷政變中的玄武門〉，頁 147。

55 鄭必俊，〈敦煌寫本常何墓碑校釋〉，頁 210-231。

56 《舊唐書》，卷 74，〈馬周傳〉，頁 2612。

57 詳見 S. 2630 〈唐太宗入冥記〉，《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 4 卷，頁 134-136。

政變賦予合理化的解釋，世民在即位之後不僅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為自保而被迫發動政變者的形象，還對以太原起兵為核心的唐朝開國史進行了大幅度的重構。由於事屬隱晦，故傳世史書中對於世民一方政變參與者的具體活動記載較少，但相關人員的墓誌或神道碑中卻時常會提及志主與玄武門之變這個敏感政治話題的關聯。通過梳理政變參與者的相關資料，或有助於我們對〈常何墓碑〉中所謂「六月四日，令搃北門之寄」的理解。

《文館詞林·左武侯將軍龐某碑序一首》記載秦王府左內馬軍副總管龐某，因為在武德「九年六月，業預艱難，效彰忠款」，從而「蒙授左衛副率」。<sup>58</sup>碑文中所謂的「九年六月，業預艱難」，顯然是指龐某參與了玄武門之變。這位參與政變的龐某，應即曾「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的龐卿憚。<sup>59</sup>由於其卒於貞觀二年（628）六月，葬於當年十月，碑文製作的時間距離事變未久，太宗君臣對於「殺兄弟，囚慈父」的行徑尚有所避諱，故碑文的內容較為隱晦。〈左屯衛大將軍周孝範碑銘一首〉載誌主「武德五年授秦王府右庫真車騎將軍……（武德）九年六月，改授太子右內率，仍檢校北門諸仗……貞觀元年授右屯衛將軍於玄武門領兵宿衛，仍以本職出使北藩……還，又領玄武門內左右廂仗」。<sup>60</sup>通過周孝範在玄武門之變前後執掌的變化，可以推知在政變後掌管北門禁軍的誌主，應該也是玄武門之變的參與

---

58 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453，頁 161。

59 《舊唐書》，卷 57，〈龐卿憚傳〉，頁 2301。對於兩者的對應關係，承蒙審稿專家提示，在此表示感謝。

60 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頁 163-164。

者。周孝範卒於貞觀七年（633），並在當年葬於萬年縣。但在其墓誌中，並沒有直接提及誌主與玄武門政變的任何關聯，顯然是其家人有所忌諱。

隨著高祖及太宗相繼去世，到了高宗即位之時，唐朝君臣在心理上已經基本擺脫了玄武門政變的影響。在政變參與者的墓誌或神道碑中一改之前隱晦及迴避的態度，開始極力凸顯誌主與此次事變的關係。相關石刻文獻不僅對誌主參與玄武門之變的功績大加誇耀，而且對其因此獲得的封賞也敘述甚詳。

作為跟隨世民發動政變的九名親信之一，尉遲敬德在玄武門之變中殺元吉、退宮府兵、迫使高祖就範，居功至偉。其卒後，於高宗顯慶四年（659）四月十四日陪葬昭陵。在其神道碑中即記載：「時外難初康，內釁方兆。春坊階亂，構禍深於戾園；李屏窮凶，為蠹尤於傲象。公早參帷幕，思固宗祧，驟起聖懷，累明大義。九年六月，二凶伏辜，雖天道禍淫，蓋杖君之筭也。擢拜左衛大將軍兼太子左衛率。」<sup>61</sup>碑文中所載的「二凶伏辜，雖天道禍淫，蓋杖君之筭也」，凸顯了敬德作為政變頭號功臣的重要作用。作於麟德二年（665）的〈程知節墓誌銘〉載：「（武德）九年夏末，二凶作亂，太宗受詔，宣罰禁中，公任爪牙，效勤心

---

61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尉遲敬德碑》，頁145-146。雖然〈尉遲敬德碑〉詳細記載了敬德對玄武門政變的參與情況，但〈尉遲敬德基誌銘〉卻僅記載志主在武德九年的授官情況，並未明確提及其與政變的關係。神道碑和墓誌銘作為兩種可以同時作用於一人的文字載體，雖然均具有為志主歌功頌德的功能，但側重點或有不同。具有「紀念碑」性質的〈尉遲敬德碑〉公開展示了敬德對玄武門事變的參與，證明此事是尉遲家族引以為傲的功績，是向當世所公開展示的內容。〈尉遲敬德基誌銘〉中不及此事，或是為了避免與神道碑重複記載的緣故。

簪。事寧之後，頒乎大賚，賞絹六千匹、駿馬二匹、並金裝鞍轡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國，授東宮左衛率。」<sup>62</sup>雖然墓誌中通過「二凶作亂，太宗受詔，宣罰禁中」的記載，對世民發動政變加以掩飾，但對於誌主在政變中所起的作用及事後的封賞情況卻記載的非常詳細，在內容上毫不含糊。此外，作於龍朔三年（663）的〈鄭仁泰墓誌銘〉載：「于時儲闈階亂，禍極戾園。……公（仁泰）奉睿略於小室，肅嚴誅於大義，二凶式殄，諒有力焉。其年，授遊擊將軍，賜爵歸政縣侯、邑七百戶、別食綿州實封二百戶。」<sup>63</sup>作於乾封元年（666）的〈李孟常碑並陰〉亦載：「二凶挺禍，窺覷神器。釁生非慮，義在泣誅……于時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也。重離啟聖，即授右監門副率，賜物五千段，黃金五百兩，以其年七月，除右監門中郎將，封武水縣開國公，仍別食實封四百戶。」<sup>64</sup>在鄭仁泰和李孟常墓誌中所斥責的「二凶」，顯然就是指建成、元吉。

除了上述玄武門之變核心人員的墓誌對參與政變毫不隱諱外，尚有多方作於高宗時期的墓誌記載了政變次要參與者的情況。作於永淳二年（683）的〈安元壽墓誌銘〉云：「于時皇基肇建，二凶構逆。公特蒙驅使，委以腹心，奉敕被甲於嘉猷門宿衛。既而內難克除，太宗踐極。爵祿攸設，先酬擐甲之勞；賞命所加，用答披荊之勳。特拜公右千牛備身。」<sup>65</sup>根據墓誌，可知政變發生之時，安元壽並沒有參與玄武門外抵禦宮府兵的戰鬥，而前往

---

62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頁 158。

63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頁 155。

64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頁 163-164。

65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頁 201。

控制太極宮北門之一的嘉猷門。雖然嘉猷門的控制與否似乎並沒有影響到政變的走向，但安元壽還是因此獲得了官職的晉升。〈大唐故左驍衛將軍上柱國開國公（曹欽）墓誌〉載：「家難尅清，預有其力，賜物三十段，金帶一具，拜新城府別將。」<sup>66</sup>曹欽在政變成功後，僅獲得「賜物三十段，金帶一具」的物質獎勵，證明其只是此次政變的外圍人員。〈吳黑闥碑〉則載：「（武德）九年六月，與段志玄等立功於玄武門，事寧，授右勳衛中郎將，進封新鄉縣開國公。」<sup>67</sup>吳黑闥卒於總章元年（668）十月廿九日，其應是追隨段志玄作戰的下層將士。安元壽、曹欽及吳黑闥顯然都不是玄武門之變的核心人員，但通過其墓誌的描述，可知在高宗時期，能建立起與此次政變的聯繫是值得誇耀的功績。

上述參與玄武門之變的太宗功臣，在高宗朝下葬時，不僅竭力將自己塑造成影響政變走向的關鍵人物，而且均會提及自身因為參與政變所獲得的物質賞賜及官職晉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常何墓碑〉的書寫模式卻大不相同。常何在永徽四年（653）五月卒於黔州治所，六年（655）八月始返葬故里，故〈常何墓碑〉撰成的時間更在其後。雖然〈常何墓碑〉的成文已遲至高宗時代，但碑文中卻僅載常何曾「趨奉藩朝，參聞霸略」、「九年六月四日，令揔北門之寄」，不僅言語模糊，而且絲毫沒有提到其在玄武門事變中的具體表現。此外，〈常何墓碑〉中也沒有任何關於常何因為政變而受到官職及物質賞賜情況的記載，從而與上述製作於高宗朝的玄武門政變功臣的墓誌或神道碑形成了巨大

66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66。

67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頁170。

的反差。這也從側面說明常何應該並非影響玄武門之變走向的策劃者及具體施行者。

## 五、結 論

通過復原玄武門之變的具體歷史細節，可知世民、建成雙方均有屬下追隨入宮，且攜帶有弓箭等武器。所以，世民之所以選擇在太極宮內設伏，主要是為了防範建成、元吉逃歸，與是否成功收買常何及禁軍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建成雖然已經接到來自宮中的警告，但其仍堅持入宮應是自恃所謂的「兵備已嚴」，而並非自己曾經的屬下常何任職於北門禁軍的緣故。通過世民一方籌畫政變的過程，我們尚看不到北門禁軍及常何參與的痕跡。六月四日政變的具體實施可以分為若干關鍵步驟，北門禁軍只是參與了同守門兵仗及秦府勢力合力抵禦宮府兵的環節，並不足以決定事件的走向。通過秦府勢力對政變各個步驟的參與情況看，也不存在八百秦府勇士事先潛伏於太極宮之事。由於常何與玄武門之變並沒有太大的關聯，故李義府在為常何撰寫墓碑時，雖有意將常何與玄武門之變聯繫起來，但因其實在沒有具體的相關事蹟可言，所以只能含糊其辭而已。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
- 李淳風，《乙巳占》，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712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 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
- 瞿曇悉達撰，常秉義點校，《開元占經》，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 二、近人論著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11（北京），頁595-611。

- 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中國唐史學會編，《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97-125。
- 胡戟，〈唐高祖與玄武門之變〉，《胡戟文存·隋唐歷史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 198-223。
- 曹印雙，〈「玄武門之變」史事新解〉，《歷史教學》2005：6（天津），頁 66-69。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
- 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217-236。
-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 黃永年，〈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廷政變中的玄武門〉，《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頁 132-153。
- 黃惠賢，〈〈常何墓碑〉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武漢，1980），頁 16-17。
- 劉進寶，〈常何與隋末唐初政治〉，《中國史研究》，1998：4（北京），頁 86-95。
- 劉嘯，〈玄武門事變新考——以「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0：2（上海），頁 161-177。
- 劉蓬春，〈「玄武門之變」伏兵考辨〉，《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8：4（成都），頁 114-121。
- 劉蓬春，〈「玄武門之變」伏兵計考析〉，《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8：10 增刊（成都），頁 1-6、20。
- 鄭必俊，〈敦煌寫本常何墓碑校釋〉，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210-231。

#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th Gate Guard and the Xuanwu Gate Coup of 626, with a Focus on the Role of Chang He**

Jun Li

Northwest University History School

Li Shimin launched the Xuanwu Gate coup to seize the throne on the fourth day of the sixth month of 626. It does not seem that Chang He, who was then with the palace guard at the North Gate,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Li Shimin's setting an ambush in the Taiji Palace, or with the Crown Prince's insisting on entering the palace even though he had received a warning. Although Li Shimin had once gone through Chang He to bribe warriors in the palace guard, we do not find direct evidence that the North Gate Guard participated in the coup planning process. The North Gate Guard was only involved in one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p, and it was not a determining force. If we compare the stele inscription recording the life story of Chang He with the inscriptions for the Xuanwu Gate coup heroes produced in the reign of Gaozong, we can show that Chang He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 Xuanwu Gate coup.

**Keywords: the Xuanwu Gate Coup, Chang He, the North Gate Guard, stele inscription**